

中原

古代

著名战役

刘玉娥 韩中兴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E291
20

ZhongYuan GuDai ZhuMing ZhanYi

中原古代著名战役

刘玉娥 韩中兴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原古代著名战役/ 刘玉娥, 韩中兴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1115 - 083 - 4

I. 中... II. ①刘... ②韩中兴 III. 战役—史料—
中国—古代 IV. 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1081 号

书 名	中原古代著名战役
著 者	刘玉娥 韩中兴
责任编辑	石 斌 邓池君
封面设计	李可铭 阙珍珍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 (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81
字 数	378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版 期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1115 - 083 - 2/k · 8
定 价	32.00 元



序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其中,军事学更是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很多军事名著,包含着超众的智慧和独特的文化底蕴。中原地区是产生军事理论和从事军事实践的重要地域。

中原这个词,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代,就被当时的人们大量用于口语和书面语。如《诗经·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兵圣孙武在他的兵书中也说:“力屈财殫,中原内虚。”诸葛亮《出师表》:“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宋史·李纲传》:“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明实录·永乐十四年》:“伏维北京,南俯中原。”这里所举例证中的“中原”,显然是指区别于边远地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

中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一书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因此,上启五帝,下至夏、商、周,延及秦汉以后,中原一直是政治和军事角逐的主战场。《史记》、《汉书》都详细记载有楚汉相争的故事。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尚有楚汉相争、割鸿沟为界的古战场。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徐州,古称彭城,有六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和二千五百六十年的建城历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军事重镇,古今闻名的战场。据记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后的四千多年,徐州发生过大小战争四百多次。《左传》是中国古代记载战争最多的一部书,其中一百多场战争发生在中原。所以,后人往往把在中原驰骋疆场,互相争逐权力就叫作中原逐鹿,或逐鹿中原,问



鼎中原。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鹿更是权势的化身。

正是基于此，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看重中原，逐鹿中原。自夏代到北宋的三千多年间，有二百多位帝王在中原建都，进行政治角逐。史书记载黄帝都有熊，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祝融氏都郢，在新密古城寨。夏禹都阳城，在今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一带。大禹的儿子夏启建都在阳翟，今禹州市尚有钧台，夏启曾在那里宴请过各路诸侯。夏王太康、中康、后羿、夏桀都建都在斟鄩，斟鄩就在今巩义西南的小营夏文化遗址。商汤初期建都今河南商丘，灭夏之后，商汤迁都偃师，称为西都，后又迁都郑州称亳都。商朝是历史上迁都最多的一个朝代，灭夏后曾多次迁都，但都在河南境内。周朝初期，周文王建都西岐，武王灭商后认真考察了夏人居住的地方，决心以史为鉴，建都于“无远天室”的伊洛地区。武王死后，成王命周公营建维（今河南巩义）成周。东周迁都洛阳。直到后世汉、唐、宋，都城都在大中原圈内。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大批国内外游客渴望了解现代中国，也极想了解古代中国，尤其向往神州名胜，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名胜古迹众多。不到中原就很难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探寻中原文化就很难体会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丰厚底蕴。这其中，军事学又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原战争题材丰富翔实，众多的战役，无论是双方政治、经济、外交的斗争，还是战略、战术的运用，都蕴含着极具哲理的人生智慧，很多方面可为今天的治国、建军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研究中原军事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原古代著名战役》收录了上自黄帝蚩尤涿鹿大战，下至明清之际的李自成三打开封及灭明战役，一共写了十六个牵涉国家命脉、决定王朝兴替、作战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大战役。该书运用唯物史观，依据历史原貌以道德、以勇武、以谋略，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中原古代著名战役。每个战役从开始到酣战至结局，包括投入兵力、胜败之因、敌我友三方形势、战略、战术、间谍、游说、武器装备、粮食供给等，都有



详尽的交待,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为一体,兼及天候、地形、风土、人情。该书最突出的特色是写战争而不局限于战争本身。战争的胜负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策略、战术运用、武器装备、粮草辎重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给今人以较大启迪,编著者把重心放在谋略的运用方面。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一份极具价值的中原古代战役史料,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祖国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增加对故土、家乡、亲人的深沉依恋,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热情。

中原文化研究所刘玉娥教授请我为《中原古代著名战役》一书作序,很高兴能为此尽点义务。作为一名戎马生涯六十余载的老战士,曾随刘邓大军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大决战、打过长江去、进军大西南的艰苦斗争,亲历了平汉铁路破袭、浞河阻敌、浍河出击、血战顿庄等战斗,对曾经做出巨大牺牲的中原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怀有眷恋之情,更不会忘记为解放这片土地而献出生命的战友。每当追忆起那段岁月,内心依然激动不已。研史鉴今,古为今用。我们要加大对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力度,加强国史军史党史教育,用强烈的中国心凝聚民族情,激励炎黄子孙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建设强大的国家贡献聪明才智!

李来柱

2006年12月1日

(原北京军区司令员)



序二

刘玉娥教授与韩中兴同志合撰的《中原古代著名战役》一书即将付梓,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中的新成果,特撰此小序权作祝贺。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中原古代著名战役》,是从古代中国在中原发生的三百余场战争中,精选了十六个典型战例。这十六个典型战例都是关系着国家命脉,王朝的兴衰,且有重大军事研究价值的重要战役。这十六个典型战役按性质分类,有改朝换代战争,有统一战争,有争霸战争,有平叛战争,有农民战争。刘玉娥教授在每篇文章之后,对每个战争的胜败原因及所应吸取的经验教训,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前言》中又作了全面的总结,我除赞同之外,在这里还想谈一谈某个战役的主要胜败原因及所应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

牧野之战周所以胜殷,我认为周把握好作战时机是主要因素。武王伐纣实际上是出兵两次。第一次出兵是在武王九年,周军至孟津相会者有八百诸侯,都说“纣可伐矣”。但武王考虑殷的一些贤人仍然在位,殷的政局还能维持,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决定退兵。过了两年,纣杀比干,囚禁微子,箕子“佯狂为奴”,殷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昏悖已不可救药,纷纷投奔周国,武王知道殷的政局已混乱不堪,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决定出兵伐纣。牧野一战成功。纣军七十万“前徒倒戈攻其后”,举行起义,纣王被迫于摘星楼自焚,商朝灭亡。淝水之战对前秦来说也是统一战争,但前秦苻坚由于没把握好作战时机,急欲求成,结果一败涂地。苻坚是氏族领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王猛的辅佐下,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很快就灭掉前燕、前凉及代国而统一北方,并占领四川,对东晋已占有绝对优势,这时苻坚已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王猛临终时不可伐晋的遗言,不听张夫人及大臣们的劝阻,看不到他政权内部鲜卑族、氏族领袖欲恢复政权的矛盾,更看不到东晋谢安当政,局势稳定,且建有“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的北府兵,而急欲消灭东晋而统一南方。他认为“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



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箬”，而冒然发动对晋战争，结果在淝水之战中一败而不可收拾。当然淝水之战东晋胜利，与谢安、谢玄指挥有方，北府兵浴血奋战及朱序的帮助诸因素有关，但苻坚没有把握好时机，在主客观都不具备统一条件下而发动了统一战争，使苻坚落个国破身亡的失败下场。

城濮之战与殽之战都是争霸战争。城濮之战是楚、晋争霸，殽之战是秦、晋争霸，战争的结果则是晋胜而楚、秦失败。这两次战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楚、秦两国的国君对其领兵主帅的处置则各不相同。楚成王则把楚军失败的责任完全归之于楚军统帅子玉（成得臣），并迫使子玉自杀。其实子玉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将领。城濮之战楚国只是左右两军溃败，而子玉直接指挥的中军并没有受损失，而是收拾左、右军的散卒而归。作为楚军统帅的子玉，对城濮之败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罪不及死。楚成王逼子玉自杀，是自毁长城。在城濮之战中晋虽获胜，但晋文公则心怀恐惧，怕子玉率楚军复仇，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后，才松了一口气，并高兴地说：“莫余毒也。”意即没有人再毒害我晋国了，说明是楚成王替晋国除了一害。秦、晋殽之战，秦军虽全军覆没，而秦穆公却把战败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秦军三位统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战败归来后，秦穆公素服郊迎，不仅不治三帅之罪，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继续领兵。三帅也立志复仇，三年之后出兵攻晋，终于复了殽战之耻，并为以后秦霸西戎树立了军威。

项羽力拔山，气盖世，猛打猛冲的战斗精神是尽人皆知的。在巨鹿之战中，项羽率军渡河后，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勇冠三军，九战九胜，消灭由章邯、王离统率的三十万秦的主力军，为灭秦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但在成皋之战中，项羽这套猛攻战术则难以逞威。楚、汉两军在荥阳相峙两年零三个月，刘邦坚持与项羽斗智不斗力。项羽最初虽然取得几次小胜，而刘邦则败而复振，并派韩信率军经河北进入山东，威胁项羽的根据地彭城，还让英布、彭越在梁、魏之间攻击项羽的运输线，使项羽后援不济，终于迫使项羽以鸿沟为界与刘邦中分天下。项羽撤军东归，刘邦随后追击，把项羽围困垓下。项羽走投无路，在乌江自刎。这就说明，作为军事统帅，勇猛冲杀只能在速战速决短兵相接的情况下



起作用,在长期战争中必须靠谋略和智慧才能战胜敌人。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凭的就是勇猛和谋略才打败王莽的百万大军。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中经常用的手段,但用诈必须熟悉并适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否则被人窥出玄机,反而会落入敌人将计就计的圈套。孙臆在马陵之战中用退兵减灶之计,以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就是因为孙臆深知魏军统帅庞涓轻视齐军,骄傲自负的心理,诱使庞涓离开魏军大部队,率轻骑急追齐军,结果在马陵庞涓进入孙臆的伏击圈,庞涓自杀,魏军全部被歼,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用诈破敌最成功,也最典型的战役。

在战争中能否用贤纳谏也是胜败的重要关键,官渡之战曹胜袁败于此有密切关系。官渡之战开始时,关中诸将“以袁曹方争,皆中立观望”,曹操接受卫觋的建议,派司隶校尉钟繇移治弘农,以招抚关中,“关中由是服从”。在刘备统治徐州后,便与袁绍连接,从东方威胁曹操,曹操欲征刘备,诸将怕袁绍出兵支援刘备,表示反对,唯独郭嘉知道袁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迅速出击必能取胜,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出征刘备大获全胜,稳定了东方的局势。袁绍遣颜良袭击白马,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进驻延津,佯欲渡河,以分散袁绍的兵力,取得了斩颜良解白马之围的胜利。此后,又用奇计破袁绍的追兵,阵斩文丑,使“绍军夺气”。袁曹两军在官渡相峙一年有余,曹操知粮草不济欲退回许都,写信征求荀彧的意见。荀彧回信反对撤兵,认为“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接受荀彧的意见,坚守阵地,等待时机。最后接受袁绍降将谋士许攸的建议,袭击乌巢,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由上可见,曹操每次胜利,都与他用贤纳谏有重要关系。袁绍与曹操相比恰恰相反,他在官渡之战中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他手下也有田丰、许攸、沮授等智能之士,如果他也能用贤纳谏,也有取胜的机会。袁绍在刚破公孙瓒之后,就决定对许都发动进攻,沮授谏阻说:“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不可动也。”袁绍不仅不听劝阻,反而削夺沮授的军权。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袁绍则以儿子有病为借口,不肯出兵。



当曹操战胜刘备而归时，袁绍又要出兵攻许，田丰说时机已过，不可出兵，并建议派游兵袭扰河南，“救右而击其左，救左而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克也”。如袁绍能接受田丰的建议，袁曹谁胜谁败就很难说了。袁绍不仅不接受田丰的建议，反以“沮众”之罪，把田丰先下狱后处死。袁绍遣颜良攻白马，沮授说：“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颜良阵亡，袁军大败。曹操袭击乌巢，袁绍只以轻骑救援乌巢，而以重兵攻曹军营寨，张郃谏议说：“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又说如果乌巢失守，我们就彻底完了，袁绍又不听。袁绍志大才疏，多谋少决，不能用贤纳谏，刚愎自用，众叛亲离，许攸、张郃、高览等皆叛袁归曹，导致袁绍的最后失败，这一教训是必须吸取的。

宋金汴京之战，论实力宋军强于金兵，如果勤王军与汴京守军里外夹击金军就有可能取胜，这也是金兵被迫第一次撤退的原因。但在宋统治者方面，当金兵第一次围汴时，宋徽宗“不复议战守”，将皇权让给太子赵恒（钦宗），仓惶南逃。在金兵被迫撤退后，徽宗就返回汴梁，仍然是“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投降派又得势，遣散勤王军及民兵。金兵得知汴京城防空虚，又第二次进攻汴京，徽、钦二帝主动撤去汴京城防，开门投降，北宋灭亡。从汴京之战看，在战争关键时刻，最高决策者的态度是何等的重要。

汉平定七国之乱，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周亚夫坚守昌邑按兵不动，并派轻骑断绝吴楚叛军的粮道的战略起到了决定作用。但“七国之乱”的最大教训，是听信七国“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谎言，为了让七国早日退兵，而把晁错“朝服斩于东市”，使忠臣寒心，从此“清君侧”就成了割据势力起兵反对中央的借口。安禄山叛唐，“以讨杨国忠为名”，实际打的也是“清君侧”的旗号，令人深思。

李自成中原灭明之战也很有特色。李自成三打开封不下，改变策略，决定先击败明军主力孙传庭，建立农民政权，然后由陕西进攻北京，其战略是正确的，但推翻明王朝之后，农民军将领很快腐败变质导致失败，其教训也是深刻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已有警戒性的忠告，在此不再赘言。总之，从《中原古代著名战役》中可以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由于笔者认识水平所限，只能就此而止了。



李白在游黄鹤楼时，本想题诗述怀，但看到崔颢的《黄鹤楼》诗后，就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于是“无作而去”。对李白所说的两句话，我长期不能理解，为什么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在见到崔颢的诗后，就“有景道不得”，“无作而去”呢？这次在给本书写序时，对李白的诗突然有所领悟。刘玉娥教授本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中年学者，已出过几部专著，发表过很多论文，但她仍很谦虚，仍以学生自居，待我以师礼，每有新作必让我先过目。这次《中原古代著名战役》完稿后，请我给她们写篇长序，我已应允。在我看完书稿准备写序之前，她又将李来柱将军为本书写的《序》拿给我看。李将军身经百战，军事理论娴熟，对本书的要点、特点、优点都已指明，我真是无话可说了。但既已答应玉娥教授写序，也不好食言，只能以此小序塞责了。

朱绍侯

2006年12月14日于雏飞书屋
(河南史学专家)



前言

“中原”是个地域名词。黄帝、尧舜,到夏商周三代,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天下之中的概念,久而久之,中原一词,就成为天下之中的代名词。古代所说的中原地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除中州外,还包括关中、晋南、鲁西、河北南部,以及江汉地区。狭义的中原主要指今天的河南省。中原由于居天下之中,嵩岳屹立其中,秦岭、大别、桐柏、泰山等诸山环抱,黄河贯穿东逝,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中原地区由于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且关山险阨,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中原居天下之中适宜生存的地理优势,让人意识到“当取天下之日,中原在所必争。”“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信条。上启五帝,下至夏、商、周,延及秦汉以后,中原一直是政治和军事角逐的主战场。《左传》是中国古代记载战争最多的一部书,其中二百多场战争,大都发生在中原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从黄帝、炎帝阪泉大战到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明止,天下战争将近四百余场,其中发生在中原的就达三百余场。可以说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几乎都是在中原地区进行的。所以,后人往往把在中原驰骋疆场,互相争逐权力就叫作中原逐鹿,或逐鹿中原,问鼎中原。

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历代战争的经验也是极为丰富的,其价值也是极为珍贵的。中国军事历史的丰厚积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的行进历程,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借鉴历史经验,就不能不对这些发生在中原的著名战役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前人依据实战经验总结出来的军事理论著作,是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珍贵资料,是先人智慧的凝结。虽然岁月更替,有些战略战术原则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发展,但是古代军事家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指挥艺术、作战技巧,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智慧启迪。正是本着汲取传统军事学精华服务于现



实社会的原则,我们从发生在中原近四百场战争中,择取十六个牵涉国家命运,决定王朝兴衰,规模大、影响久的著名战役,详细叙述其初始终末及战役的全过程,以便从中窥视古人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汲取智慧以利今日之社会。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读者,我们在叙述所选战役时打破以往写战争只写战争本身经过,较少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天候等因素。其实战争的胜负不只是军事本身,而是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战术运用、武器装备、粮草辎重等诸多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给今人以较大启迪,我们的重心放在谋略的运用方面,重点突出以下思想精华。

一、用贤强军思想。得人则昌,失人则亡。其意有二,所谓得人,一为得民众,即得到天下大多数人的拥护。一为得英雄,即得到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在人才济济,文武俱备,科技发明鼎盛,人民拥护的形势下国强民富,而且强于敌国,自然国泰民安。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重视哲人的智慧。《诗经·大雅·瞻印》就提出:“哲夫成城”的话。《鬼谷子·摩篇》中也说:“主兵曰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这是说战争首先要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孙臆也提出:“得众胜”,“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这些都是在说明用贤用众才能强国强军。要想国富兵强,首先就是要注重综合国力的提高,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力量都要强大。其次是要以己之长对敌之短,又以敌之长,克己之短。要想战胜敌人,必须长于敌人,反过来说不强于敌人,就要受制于敌人,被动必然要挨打。历史上汉武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突厥,都能以匈奴、突厥谙于骑射,而自己也重骑射,并跨而超之,从而摆脱被动的局面,战胜敌人并强盛起来的。相反,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也正是因为不能做到“师夷长技以治夷”而被灭亡的。当然宋、明灭亡的原因还有其它方面。

二、勇武当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战争指挥者能够窥测战机,敢于与貌似强大的敌人决战,这往往是弱者战胜强者的一个关键。如周武王以数万兵力对殷纣王七十五万人,终于灭纣兴周。淝水之战时谢玄仅以八万北府兵面对



符坚一百万人马，最终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动摇了符坚的统治。官渡之战曹操以不足万人的兵力抗拒袁绍十万大军，靠着毅力和谋略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初唐洛阳之战，李世民为掌握破敌真实情报，仅带领五百精骑到北邙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在魏宣武帝陵上，陷入王世充万人包围圈，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跃马直取世民，世民毫不畏惧，坚持战斗，安然回归。初唐大战，李世民屡以少胜多，坚持顽强抗战，打败王世充、窦建德，夺取最后胜利，都是得力于勇于坚持，勇武当先，敢于打硬仗。这些都是以少胜多的典型例证。虽然对垒双方兵力悬殊，但由于弱者一方能够正确运筹，敢于和强者决战，最后终于靠着谋略和勇气战胜强者，取得成功。

三、武功要常备不懈。孙武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自己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准备好使对方无法进攻，而保有充足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疏于军备，导致灭亡的朝代，比较明显的是宋朝，其次是明朝。如北宋末年，战备如同虚设，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北宋的骑兵上马必在马上双手扶马鞍，方能行走，别说拿武器打仗了。试想这样的骑兵打起仗来，怎么能够不失败？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守卫北京竟用太监坐城指挥，大臣几乎全不知兵，一旦临难，只有哭泣、殉节而已。这与国家安危有何益处，探究历史经验可知，要想保国必据军事实务，还得遵循：“不备、不虞（警惕、忧患）不可以师”和“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的原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待敌之可胜，不可在己，可胜在敌。”不管是平时或是战争时期都应这样严加戒备。上面提到的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的情况，正是因为文恬武嬉和政治腐败所导致的结果。有备则无患，这是千古名言。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小动物蚂蚁，它们的洞口朝天，一有雨水就可淹死。但小小的蚂蚁却能常备不懈，晴天垒巢，用土相堵。未雨绸缪，必能救危。蚂蚁身躯虽小，又身处下洼险地，而每次却都能排除灭顶之灾，子孙繁衍众多。小虫尚且如此，何况于人？难道有着聪明智慧的人类还不如小小虫子吗？《诗经·豳风·鸛鸣》有言：“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常备不懈，才能



抵御突如其来的入侵，保卫家园安固。

四、兵以诈立，重谋略运用。战争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正如孙子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是国之存亡，性命攸关的大事，怎么敢不慎重呢？战争一旦打起来，必拼死相争，务期必胜，否则后患无穷。任何犹豫、仁慈都是不可取的，都可能会导致灭亡结局。宋襄之仁，千古所鄙，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真乃战争的千古名言。他还说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兵以诈立的唯一目的是胜利。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准备灭殷商，夺纣王之江山，姬昌曾问计于姜尚。姜尚说：“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佯首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意思是说，凶猛的鸷鸟要伏击时，往往弯下身子，收缩翅膀。野兽将要搏击时，往往先低下头匍伏在地上。有杰出谋略才能的圣人也是一样，他将要有所行动的时候，也必是先装出卑躬侍人的愚笨样子。姜尚这里是授计于姬昌，要他运用假象以迷惑纣王。姬昌采纳姜尚谋略，为迷惑纣王，献洛西之地，又协约众诸侯，对纣朝贡。又为玉门装饰宫殿以示奢侈，筑灵台外示享乐，列侍女撞钟击鼓，伪装荒迷于女色歌舞之中。这些假象果然迷惑了纣王，纣王得意的说，姬昌这样（无作为）我还有什么担忧呢！姜尚又让散宜生、闳天暗地重金收买费仲、尤浑而游说于纣王之旁，以通情报，还借用纣王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的名号和权力，扩大自己的领土，有计划地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经过姬昌、姬发几十年的努力，最终灭了殷纣王。

孙臆更是成功地运用了其祖孙武“兵以诈立”这一军事理论。在围魏救赵中，孙臆实践其祖“兵以诈立”，利用减灶，以迷惑庞涓；曹操官渡之战，以袁军服装、旗帜奇袭乌巢；唐太宗设疑兵以退突厥等等，他们都是用诈的里手行家。以近代而言，日军奇袭珍珠港，希特勒对苏的不宣而战，亦是战争之奇者。《六韬》中的“乌云之阵”，取鸟散云合之义，即分合变化之亟，化整为零，云涌而集，神秘莫测之谓。即便当今若在山、泽之国打游击，以弱胜强仍有其现实意义，弱之所以能胜强，其关键仍是要坚守“兵以诈立”的策略。

五、重视伐交，争取盟友，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所谓“伐交”，就是



运用外交策略,破坏敌国与它国的联盟,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收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效用。战争是交战双方总体力量的竞争,取决于势、力的较量。战争中除敌对双方冲决交战之外,第三者即友军往往起着最后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如先轸在城濮之战的巧联齐、秦,打拉曹、卫,使战争出现转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汴京之战中,金联宋灭辽和拉夏攻宋,也是成功的利用外交手段,逐一灭掉强大的敌方。官渡之战前夕,曹操为了争取力量打败袁绍,拉吕布、亲刘备、结张绣,稳定关中,成功地运用了外交政策,终于以少胜多战胜袁绍。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成功运用伐交壮大自己,孤立敌军,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军事家,他们伐交的结果,壮大了自己,孤立了对方,使自己争取到最后打赢战争的主要条件,从而牢牢掌握了战争取胜的主动权。这方面的智慧是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

六、因敌变化,出奇制胜。战争有很多难以把握的突变因素,战局瞬息万变,应对必须灵活,战机稍纵即逝,必须看准战机,抓住机遇。《孙子兵法·虚实》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如官渡之战,袁、曹相持时双方都精疲力尽,特别是曹操,曾因兵寡粮缺,陷入困境,最后因袁绍谋臣许攸投奔,由许攸献计烧袁绍乌巢军粮,曹操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机遇,既抓紧,又抓狠,结果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再如淝水之战,因朱序透露苻坚的内部情报,向晋将领谢安、谢玄建议乘秦苻坚各路大军未集时,击其一路。谢安、谢玄因之改变了原来的固守防御战略,集中兵力攻打苻坚、苻融一路,结果晋军获胜,取得淝水之战大捷,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光辉范例。再如明清之际,李自成攻打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当时吴三桂处清和李自成前后夹击之下,在此形势下他投降了满清。当时清主帅多尔衮毫不犹豫地与吴三桂合作,攻打李自成,结果很快占领了北京。还有孙臆的围魏救赵,批亢捣虚,攻打庞涓的要害大梁,迫使其不得不回救,而较当初田忌所拟奔赵相搏要高明得多。孙臆由田忌的自己疲于奔命使敌以逸待劳变为让敌疲于奔命,而齐军以逸待劳,从而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完成了救赵胜魏的使命。由此看来,高明的



将帅，用兵应以敌情变化，灵活趋机为要。

七、守险、挫锐，打持久战。守险、挫锐，是在己处劣势，守而待机，最后战胜强敌的有效战略。我国早期的文化典籍《易经》一书中就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孙武在《孙子·地形》篇中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孟子》书中亦有“天时不如地利”的话。尤其在古代，科学不发达，天险不易逾越，很多关院，易守难攻，为弱寡一方所利用，以御强敌，久而待机，终而弊之。孙武在《孙子·地形》篇中还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武子的这个话至今仍有其生命力，显示出我国军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幽渺微妙。所谓“九天”自然是太空领空了，而《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人们防守可在九地之下进行，而却没有飞天的本领，而孙武却憧憬着，“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孙武的憧憬已变成了现实。孙子特别重视实地考察，对军事情报的获得不靠于鬼神。他在其兵法《用间》篇中很严肃地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而他对善攻善守双方的描绘、估计，时至今日，攻、防方式都已被证实了。这是中国军事文化所特别值得自豪之处，也是其博大精深之实质。

在守险、挫锐方面，运用极为成功而突出的例证很多。如刘、项成皋之战，楚、汉相持荥阳虎牢达三年之久，终以刘邦弱者拖垮了强者项羽，夺得了天下。七国平叛一役中，周亚夫守成皋，坚壁下邑，断敌粮道，终灭吴王。唐初李世民与薛举父子及刘武周相持，在占有明显优势的强敌前，都是以守险、深沟、高垒而挫强敌，断其粮道，伺机而克敌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拿破仑，败于俄国库图左夫。二战时，希特勒败于苏联的朱可夫，除国际、国内的诸因素外，在天候上受挫于严寒，加之受地理遥远的制约，后方支援供不上，最终打了败仗。美国和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数年反抗不息，使美国政府深感头痛，美联军的迟迟难以取胜，不能说不是受一定地理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科技发达，信息灵通，交通迅捷的时代，制空、制海权能对战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